

唐凯麟 / 主编

中华民族 道德生活史

王泽应 唐凯麟 / 著

宋元
卷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唐凯麟 / 主编

中华民族 道德生活史

宋元卷

王泽应 唐凯麟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宋元卷/唐凯麟主编;王泽应, 唐凯麟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 4

ISBN 978-7-5473-0766-3

I. ①中… II. ①唐… ②王… III. ①伦理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宋元时期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179 号

丛书策划: 梁 惠

责任编辑: 梁 惠

技术编辑: 徐儒静

装帧设计: 一步设计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宋元卷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0.75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66-3

定 价: 77.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目 录



绪论 性命义理与事功利欲激荡颀颀的宋元道德生活 / 1

第一章 宋元时期道德生活概况 / 7

第一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德理想主义及其确立 / 8

第二节 “等贵贱、均贫富”价值目标的提出与农民道德意识的
苏醒 / 19

第三节 “卫我河山”与民族战争中的忠勇正义行为和气概 / 29

第四节 宋与辽、金、西夏及元蒙民族道德生活的交流和融合 / 44

第二章 商品经济、功利意识与经济道德生活 / 55

第一节 “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及伦理影响 / 56

第二节 商品经济发展与功利意识的凸显 / 61

第三节 城市的发展繁荣与市民伦理价值世俗化 / 81

第四节 富国与富民的论争及经济价值观的探寻 / 90

第三章 体制改革、制度伦理与政治道德生活 / 103

第一节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与中央集权政治的
强化 / 104

第二节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文官政治及其伦理影响 / 113

第三节 新政、变法和党争对政治道德生活的影响 / 121

第四节 元代行“汉法”及民族分等政治的伦理蕴含 / 147

第四章 性命道德、理学思想与主流价值观的重整和再造 / 159

第一节 理学伦理思想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 160

第二节 理学伦理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 167

第三节 理学的伦理价值旨趣和道德精神建构 / 181

第四节 元代理学伦理的正统化、通俗化和世俗化 / 194



第五章	科举、书院、旌表对道德教化的注重及影响	/ 209
第一节	科举取士及对道德教化的凸显	/ 210
第二节	书院和私学成为道德教化的重镇	/ 220
第三节	旌表制度及对道德生活典范的奖励与推扩	/ 234
第四节	佛道二教对道德教化的倚重与强调	/ 256
第六章	孝道、贞洁、家训与婚姻家庭道德生活	/ 267
第一节	宋词元曲对爱情和幸福婚姻的讴歌与追求	/ 268
第二节	贞洁、缠足及女性地位的变迁	/ 277
第三节	“二十四孝”的出现及孝道的强化	/ 289
第四节	家庭道德教育传统的光大与弘扬	/ 301
第七章	崇道、敬业、精技与职业道德生活	/ 309
第一节	士大夫精神、伦理品格与道德实践	/ 310
第二节	官德修养及其伦理实践	/ 330
第三节	商业精神与商人道德	/ 347
第四节	医乃仁术和医生道德风貌	/ 356
第八章	休闲、风气、民俗与公共道德生活	/ 369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公共道德生活格局	/ 370
第二节	休闲生活之多元及所遵循的道德规范	/ 383
第三节	恤老济弱的仁义风气流播	/ 388
第四节	乡规里约和理学家的劝俗活动对公共道德生活的建构	/ 394



第九章 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道德生活 / 403

第一节 契丹族及辽朝道德生活状况 / 404

第二节 党项族及西夏道德生活状况 / 411

第三节 女真族及金朝的道德生活状况 / 419

第四节 蒙古族的道德生活状况 / 427

本卷结语 宋元时期道德生活的初步评价 / 435

第一节 宋元道德生活的基本特征 / 436

第二节 宋元道德生活对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贡献 / 442

第三节 宋元道德生活的绝对化及其消极影响 / 450

参考文献 / 461

索引 / 466

后记 / 483

绪 论

性命义理与事功利欲激
荡颀颀的宋元道德生活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成熟并呈现出某种由盛而衰发展趋向的历史时期,伦理道德与社会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日趋精致、成熟且产生一些僵化乃至衰朽迹象的历史时期。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既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传承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又是与宋元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定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宋元时期,以“三纲”为核心、以“忠孝节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在理学的创制中走向完备。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走向完备之日,也正是其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弊端充分显现之时,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成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需要和表现,成为压抑人性或如后世学者批评的“以理杀人”的工具。

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教育诸因素的影响,本质上是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工商业的繁荣,催生着市民意识及其世俗化和功利化。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及其所催生的士大夫精神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表现,重文抑武治政之策诱发的边关虚弱以及与辽、金、西夏、蒙古诸少数民族的矛盾贯穿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演绎出一幕幕战与和的历史活剧。儒佛道三教合一所产生的理学思想及其发展传播,将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围绕着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建设与挺立,理学内部各家各派开展了积极的辩难与论争。与此相关,社会道德教化在科举考试、书院教育、旌表制度中获致普遍化的效应,彰显出特有的功能,使得这一时期的道德生活较之秦汉隋唐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是对当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和伦理化再现,同时又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着特有的影响。

宋朝的建立充满着道德生活方面的拨乱反正和建一新局面的气象,君臣和士大夫均矢志一改唐末五代之道德乱象,把匡时救弊、扶危济困和“为万世开太平”作为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主要目标。“夫宋太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世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惓惓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①宋太祖的称帝既没有长期积累的仁德,也没有

① 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页。

拨乱平天下的武功,是在一种兵变的情况下建立大宋政权的,故而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恐惧。这种内在恐惧包含着怎么更好地维系政权,防范别人觊觎政权以及化解社会敌对势力等因素。“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寢衰寢微,以消失于无形。盛矣哉!”^①这种内在恐惧使得宋太祖及其统治者谨小慎微,不敢懈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忠厚之德对待前朝帝王的子孙,以宽大之德来培养文人士大夫的志气,以节俭朴素来养育百姓的生计产业,同时还立下“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三条规定,开创了宋初道德生活的新局面。当然,宋初赵普建议并为太祖同意的重文抑武治国策略以及“杯酒释兵权”亦开“弱宋”之先河。后来的庆历新政、熙宁新法一方面欲解决宋朝的“积贫积弱”问题,另外一方面又使功利意识、富强之术广泛传播,使得矛盾进一步深化,党争持续不断。以儒治国和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催生着文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精神的蓬勃发展,致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得以普遍高涨,理学道德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于这种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得以确立,并达致“造极”之境。民族关系的犬牙交错及军事上的冲突战争,又使得理学的心性之学遭遇各种批评,富强之术和金戈铁马不断被人们所看重,但统一之后的平治天下又在重拾理学的存理灭欲以及各种规范人心的价值观。

宋代对华夏文明特别是伦理道德有再造之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宋代学术文化,规模宏大,气象万千。宋学兴起不仅是儒释道三教从鼎立走向融合的产物,而且表征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智慧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高度。就伦理文化而言,两宋时期既是理学伦理思想兴起和发展的时期,亦是事功之学得以萌生、传延的时期,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行发展且互有颀颀辩驳的发展格局。宋代道德生活的“淡雅”、“严谨”、“清醇”与理学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推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道德价值追求和人格信念在相当程度上展现出两宋时期道德生活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义理的形上

① 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页。

②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7页。

追求借助天命等概念由是而彰显推扩，建树成一个细致而精微的理学架构，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矗起趋向航标，可谓在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成功运作。宋元之际通过官方的科举取士与民间的书院教育，形成德化天下的网状结构。与理学价值观走上意识形态舞台，权威主义的伦理范式得以建立，道德教育、道德表彰较之汉唐更为自觉且带有某种行政治理的意义，于进步的同时也蕴含着某种停滞、僵化的因素。

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和伦理文化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以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独特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学理的建构著称于世。宋元在文学艺术上贡献了可与“汉赋”、“唐诗”、“明清小说”媲美的“宋词”和“元曲”。宋词作为一种融合中原民间音乐与西域及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而形成的音乐文学形式，成为有宋一代人们抒发内在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重要手段。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都用特定的方式表现人们道德生活的不同画面。豪放派大多具有乐观主义的伦理基调和理想主义的伦理精神，婉约派则往往具有悲观主义的伦理基调和现实主义的伦理精神，二者相互激荡，共同促进着宋词艺术的发展。元曲是继宋词后产生的又一重要艺术形式，包括散曲和杂剧两部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元曲如同一部百科全书，生动再现了元代道德生活的情境和状况，涉及怀古咏史、叹世忧思、愤世嫉俗、男女相思、山林隐逸和对现实政治的品评与人生的感怀。元曲中亦有旷达高远的超越主义和关注现实的享乐主义，浸润其间的快乐主义与德性主义在相互批评中获得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民族发展和融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曲折历史过程中向前发展。……各个民族的英主竞相展现自己的才能，宋太祖、太宗等是一代英主，而契丹的辽太祖、辽圣宗，西夏的景宗，女真族的世宗、章宗，蒙古族太祖、世祖等，都是在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君王。”^①辽、夏、金、蒙古游牧民族兴起与政权的建立，与两宋发生了最为纠结的关系。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攻击，既催生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与救亡观念，产生了一批

① 郑师渠等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民族英雄和勇武之士,也削弱着宋代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形成“弱宋”或“积贫积弱”的现实,最后使宋亡于蒙古族的铁蹄之下。蒙古族以彪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中原,建立一个“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近辽左,南越海表”^①，“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的空前广大的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元世祖忽必烈一改漠北旧俗,极力推行汉化,“行中国事”,使程朱理学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获得了在道德生活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尊贵地位。“元之君,虽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駸駸乎中国之道矣。”^②元代道德生活在前期充满一定的宏大气象,后来归于沉闷与压抑。民族的歧视,等级的森严再加各种经济、政治的衰朽,最后导致元末农民起义,元朝被推翻,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宋元时期既是重道义、重内化和重气节的士大夫精神和道德主体性得以高标和风化于世的时期,也是重事功、论利害和重人生享受的商人伦理和道德生活世俗化喷涌而出而为自己争地位的时期。学做圣贤,志在豪杰,一时成为人们的道德理想。王安石与司马光、朱熹与陈亮等人开展的论争,大抵带有事功优先还是道义优先的伦理特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如西方近代道义论和功利论的相互颀颀。虽然整体上道义论占据了理论上的优势,但是功利论却成为道德生活实践的主流,主宰着大多数人的道德价值选择。只是宋元时期的事功学派或功利主义思潮探讨或倡扬的功利大多涉及民众的利益或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对庶民百姓的个人利益及其道德合理性则较少关注,比之明清之际李贽、何心隐、黄宗羲等人倡言的个人功利更带有社会功利主义或普遍功利主义的色彩。

① 《元史·地理志》。

② 何塘：《河内祠堂记》，何衡《鲁斋遗书》卷十四。

第一章

宋元时期道德 生活概况



宋元时期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发展的重要时期,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价值在理学伦理思想的建构中进一步强化,社会的道德生活浸润着理学伦理思想的风骨和精神而呈现出某种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特质,士大夫道德、官吏道德和商人道德竞相表达着自己的伦理价值诉求并渴望引领道德生活的潮流。但是,随着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阶级矛盾犬牙交错,民族矛盾此起彼伏,道德生活的冲突和价值纠纷日益加剧。宋初开始并且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以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不断揭竿起义,反对宋元政权,提出并表达了农民阶级的道德价值诉求和社会道德理想。多民族政权并立以及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古)对宋王朝的侵蚀和掠夺,导致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且复杂纷纭,民族战争中产生了一批精忠报国的仁人志士或英雄豪杰,上演着一幕幕道德生活的悲喜剧。当然,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时期,道德生活也并非全是矛盾和斗争,不同民族之间道德生活也有交流融合的一面。和与战,革新与守成,理想与现实,功利与道义,呈现出某种胶着而撕扯不断的状态,构成宋元时期道德生活的基本状貌。

第一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德理想主义及其确立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意谓自己志愿辅佐国君做到甚至超过古代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使政治清明,世风淳厚。这是杜甫怀抱终生的政治理想。有宋一代,许多文人士大夫承继了杜甫的这一理想,从多方面提升和强化着这一观念,使其获得了高度的认同,并成为宋代士大夫道德理想的基本内核。

宋不同于魏晋隋唐,在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都有一种强烈的拨乱反正情节,有一种重建道德理想、匡正世风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置重个体的道德自律,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胸襟,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成为有宋一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

《宋史·太祖本纪》赞语：“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南宋时陈亮也说：“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①崇尚“道德文章”，关注“道德性命”主题，开启了有宋一代道德生活的基本旋律。

一、道德的重建与道德价值的高标

“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②前朝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使得北宋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重整道德秩序、重建道德生活的重任。宋朝建立后的几代君主都十分注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道德沦丧的教训，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略，而且在儒道佛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明。宋太祖赵匡胤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③，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德，力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多次车驾前去观瞻。开宝元年（968），他下诏云：“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败风俗，莫此为甚。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④二年，又下诏云：“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⑤三年，又下诏云：“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纯茂，擅乡曲之誉，为士庶推服者，以闻。”^⑥八年，又下诏云：“郡国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⑦赵匡胤多次下诏，对封建伦常三令五申，且用最重的刑罚惩治不忠不孝之徒，目的无他，就是企图通过重振纲常，移风易俗，使赵宋政权得以建筑在更加牢固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上。

①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三书》，《陈亮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页。

② 《新五代史·晋家人传》。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一，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④ 王称：《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版。

⑤ 《宋史·太祖本纪》。

⑥ 王称：《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版。

⑦ 《宋史·太祖本纪》。

北宋以“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士大夫作用的治国方略：“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①“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得至辅弼者多矣。”^②在这样一种重文抑武、以儒治国的大背景下，士大夫阶层充分发挥其道德主体性和个体创造性，“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从范仲淹（989～1052）《岳阳楼记》表达出来的“先忧后乐”情怀，到王安石上万言书中的“矫世变俗之志”，再到胡宏“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③之使命，充分表明士大夫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④传统的秉承与实践。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成为儒士坚持的原则，甚至逐渐形成为君臣上下的共识：“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则祖宗之家法也。”^⑤在与君王“同治”或“共治”天下的价值目标激励和鼓舞下，宋代的儒者文士多热衷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以期实现其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辛弃疾《渔家傲·为余伯熙察院寿》：“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就是以“道德文章”盛誉笔下人物的。

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生教训的总结之中。“以道德为天下所望”^⑥的欧阳修（1007～1072）在《新五代史·一行传序》中慨叹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作《伶官传序》，通过总结后唐庄宗得天下、失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出国家的盛衰主要

① 《宋史·文苑传序》。

②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③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8 页。

④ 《荀子·儒效》。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用人择相”条，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⑥ 王安石：《上欧阳永康书》，《王临川文集》卷七十四。